

施士元先生在物理学会年会上的讲话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九日

诸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

非常高兴,在百岁之际,我还能出现在物理学会年会这个氛围庄严活跃、充满吸引力的学术园地。

常言道:“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而我,习惯于泰然处事,可以说是无忧无虑地走过了百年。

回首既往,感慨殊多。1925年,我开始与物理学结下不解之缘。1929年,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去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夫人研究所学习。1933年回国

指导上将无偿变有偿,但居里夫人仍不改初衷。

由于对人类科学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她在1904年与居里同获诺贝尔物理奖之后,又于1911年因制成金属纯镭这一成果,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迄今不同类别的诺贝尔奖,极少有人领过两次,居里夫人是其中之一。1922年,她成为国际联盟知识合作委员会(Committe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成员。

居里的家庭也是个了不起的家庭。继父母同获诺贝尔奖后,他们的女儿和女婿约里奥·居里夫妇,在1934年居里夫人去世前的几个月,在镭研究所里,用人为方法产生放射线,发现了人工放射线,因而双双获得1935年的诺贝尔物理奖。一家四人三次获诺贝尔奖,这在世界科学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

然而,居里家族这四位最优秀的科学家,却有三位均因放射性物质辐射过多而患严重贫血病去世。皮埃尔·居里虽然死于车祸,但生前也曾多次被放射性物体灼伤,镭就是这样可爱又可恨的家伙。当发现那簇美丽的光时,他们被深深地吸引了;而当认识到它的危险时,又早已深深地爱上了它。他们经历了镭的发现给物理学、化学、医学、生物学带来的巨大革命。他们深信,这个文明的世界需要那道淡蓝色的微光,为此他们不惜以生命作代价。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曾临风吟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还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表达那些为科学献身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和热爱呢?

谈到这里,我自有几分感慨。据我了解,当年由于放射性研究的安全防护条件很差,搞放射性研究

之后,我一直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任教。这么多年的教学科研实践和复杂多样的生活历程,无论是经验或是教训,对后人也许会有所启迪。所以,尽管我年迈体衰,我还是撰写了这本简短的回忆录。

感谢南京大学、南大物理系和物理学会对我的关怀,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使我的回忆录得以问世。

在此,我将本书敬献给物理学会,衷心祝愿我国物理学界人才辈出,事业兴旺,不断为祖国、为人类造福。谢谢大家!

的人,因经常接触放射源,一般寿命都比较短,活不过五六十岁。那时在居里夫人镭研究所里工作过的人,如今也只有我还活着,是个例外了。当然,后来随着科学的进步,放射性的屏蔽防护工作逐步完善,再也不会出现过去那样的悲剧。比如,1934年我回国后在中央大学曾教过的学生,后来成为举世闻名的核物理学家的吴健雄,从事核物理研究实验50年,一直也没有受到放射性损伤。直到85岁时,才因脑中风去世。

我回顾自己的一生,认为居里夫人对我的影响最大,她那不屈不挠的性格、那严谨的工作作风、对科学的执着追求精神,让我终生受益。

科苑快讯

关于“灵魂出窍”的新解释

“灵魂出窍”不是什么受关注的研究课题,可是几个研究机构最近却报道了在可控条件下造成这种体验的奇特方法。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 Fédérale de Lausanne)的伦格哈格(Bigna Lenggenhager)和同仁、伦敦市维康基金会神经造影中心(Wellcome Trust Centre for Neuroimaging)和瑞士斯德哥尔摩市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艾尔森(H. Henrik Ehrsso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相似的发现。他们都是让受试者戴上头盔显示器,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来看自己,导致受试者感觉自己在身体以外的地方。

(高凌云译自2007年第8期《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快报》)